

一次研讨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学术盛会

解 光 云

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湖北省世界史学会联合主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与世界史观学术研讨会”，于1993年4月6日至8日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从世界史观的角度，探讨并进一步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国内许多知名的世界史专家、学者和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围绕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关系这一中心议题，追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展望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前景，高度评价吴于廑先生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现综述如下：

一、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认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1)史前期或萌芽时期(1949年以前)，(2)奠定基础时期(1949年至今)，(3)大发展时期(今后)。

在史前期或萌芽时期，我国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学科，只有西洋史和东洋史，且主要是西洋史。大多数学校开设的是西洋通史以及一些主要国家的国别史，如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等，只有少数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开设东洋史。似乎无一所学校开设非洲区域史和拉丁美洲区域史，以及这些区域的国别史。此外，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无力购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即使第二手的权威著作也购置甚微。在任何一个历史系中，外国史课程的图书，远远少于中国史。这一时期我国外国史的成就，主要在于教学而非研究，而专教外国史的教师也寥寥无几。

总之，1949年以前的状况，恰似中国史是大国，中国古代史是超级大国，西洋史则是附庸。但是，先驱者的功绩不可抹煞，正是他们把外国历史引进中国，并培养了许多世界史学者。尤其是他们所介绍的，都是那个时代西方史学的最新和最高水平的成就，从而使他们的继承者也能在较高的起点上建设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可以断言，若无先驱者的努力，我国世界史学科在第二个时期的建立是难以想象的。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史学科在我国逐渐建立。因学习苏联，最初引进的是苏联学者的世界史成果，实质上是学习他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世界历史。各大学也纷纷开设世界通史(通常分为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以及一些区域史和国别史的课程。同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所，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

所、南亚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等。一些大学也成立专门的世界历史研究所或研究室,如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和吴于廑先生创立的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等。少数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等)还将世界史专业和中国史专业等量齐观。

这一时期的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中的主要缺点,是过分相信苏联学者的论述,以致在移植苏联史学成就的同时,也沿袭了苏联史学中所带有的不容忽视的缺陷,如西欧中心论、严格的五阶段分期法的世界史编著体系等。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但在世界史的学术领地,从世界史观到世界史学科体系,仍未完全摆脱苏联史学的影响。直至1976年以后,我国世界史学科才走上独立研究和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6年至今,我国世界史学科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广度上看,出版了一系列区域史和国别史专著,如拉丁美洲史、非洲史、东南亚史、中东史和美国史、日本史、德国史、法国史、英国史、朝鲜史、菲律宾史、波兰史、加拿大史、埃及史等。从深度上看,世界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富有成就的深入研究,如古代史中的城邦制度和奴隶制度;中古、近代之交的15、16世纪的历史;近代史中的工业革命与现代化;现代史中的关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研究,以及二战前史的研究等。

总之,第二个时期的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已为第三个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石。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水平并不高,但在某些方面,如吴于廑先生所研究的世界通史和15、16世纪的历史,周一良先生所研究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季羨林先生所研究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其研究水平皆居世界前列。

与会者认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大发展时期必将到来,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前景诚如吴于廑先生所展望的:“凡属前景中的事物,大都是已经隐约可见并且有可能实现的事物。譬如初春季节打开窗户,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现在谈我国研究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前景,其依稀在望的情景也是这样。”

二、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建设

世界史观的涵义是什么?武汉大学安长春先生认为,世界史观是已知世界地理知识与文化观念的结合物。世界史观制约着人们对世界史的认识与研究水平,世界史研究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无不受世界史观的局限性所影响。

关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廖学盛先生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肯定有其统一性,但并非每个地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都有统一的规律。苏联史学观点中最主要的缺点之一,即在强调历史发展统一性的时候,对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注意得很不够,而在涉及多样性问题上,对于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历史发展的极大的不平衡性注意得很不够。

关于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朱寰先生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既要讲纵向发展,也要讲横向发展,落脚点应在横向发展上。一般说来,国别史和地区史着重研究的是纵向发展,尽管也包括横向发展,但其重点并非横向发展。只有横向发展,才有可能突破孤立、分散、闭塞的状态,才有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史,才能使世界逐渐成为统一的整体。如果我们仅局限于研究某国家、地区、断代和专题的历史,就无法进行世界史学科的宏观研究。

北京大学马克尧先生和西北大学彭树智先生就整体史观的问题各自发表了看法。马克尧

先生认为,我国已有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和断代史等,理应有整体世界史。这个学科,国外也在研究。在我国,吴于廑先生已开创了这个学科。研究世界历史应从宏观着眼,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彭树智先生认为,整体史观是三位一体的,其一为全局的观点,即从全局看世界,兼顾历史发展的纵向面和横向面;其二为联系的观点,即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间的相互交往;其三为综合的观点,即世界历史是综合性的学科。

在谈到世界史观和世界史编纂体系时,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世界史观和世界史编纂体系是受到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的框架所束缚。这种框架是与五种生产方式为主线的社会发展史分期和世界史分期的框架有关,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理解为五种生产方式的相继更迭,即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似乎象具有某种“生物钟”的独特生命那样而具有自己的“历史钟”,全人类似乎都要按照它所预定的时刻,依次甚至同步地进入某一历史时期。按五种生产方式的机械分期去展开阐述体系,难以清楚地展示世界史丰富多彩的内容,不能真正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刘家骥先生认为,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历史,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没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出发点。研究世界历史,既应看到世界各地、各民族、各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更应注意到这些特点的彼此影响。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和研究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将会发现站在农耕世界立场上所不能见到的许多历史景象,这对于全面把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是非常有益的。武汉大学李植枏先生认为,从整体上把握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至少应考虑国际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和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政治、经济冲突及各种力量的消长,尤其是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三、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

吴于廑先生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世界史学科的巨匠和一代宗师。60 年代初,他与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主编的 4 卷本《世界通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史著作,标志着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书作为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被普遍采用,其学术权威地位历 30 余年而不衰。从 70 年代开始,吴于廑先生又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独立发展道路,探索新的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体系。他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史的论述为指导,首次提出:世界史不应当是排除中国史的域外史或外国史,也不应当是包罗一切国家的各国历史汇编。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与描述。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探索的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这一崭新的科学的世界史观,突破了世界史研究的旧格局,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产生了巨大影响。

齐世荣先生指出,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诸如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西方史学史、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而其对世界史学科的特殊贡献是在世界通史方面:其一是科学地界定了世界史学科的认知对象,为世界史学科的定义、内容、任务、目标

等作了明确的界说,从而澄清了长期以来中外史学家在此问题上的误识;其二是创立了新的世界史编纂体系。按照吴于廑先生所下的世界史学科的界说,以及所确定的世界史的内容、主题和研究方法,就能获得一条明晰的主线,从而看清世界历史的既往进程,判明世界历史的今后发展趋势。朱寰先生认为,吴于廑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史专家,他所提出的世界史观即宏观史学,是对旧的传统的史学观点和史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推进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马克尧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从吴于廑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受益良多,其中受益最大的,一是吴于廑先生的文章《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此文为更好地研习历史指明了一条成功之路:不仅要学习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还要学习法制史,特别是对于研究世界历史上的制度问题,学习法制史尤为必要;二是吴于廑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此文使人顿悟世界史是个有限定意义的学科,从而使我们在编纂世界史著作时,一改过去那种无可奈何的搭积木式的拼凑办法而全然摆脱困境。

与会代表还对吴于廑先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庞卓恒先生指出,吴于廑先生世界史观的提出,是直接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两段论述。其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多年来,我们忽略了这些观点,更没有注意去深挖其所蕴藏的丰富内涵,而吴于廑先生却以历史学家汇贯中西的深厚功底和博大恢弘的眼界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其深蕴的内涵精辟地加以拓展,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世界史观和世界史编纂体系。这是开拓世界史新视野的第一创举。朱寰先生也认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断,我们从来没有象吴于廑先生那样从宏观史学的高度加以理解,这正是吴于廑先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突出成就。齐世荣先生进一步指出,吴于廑先生所撰写的四篇相互关联的重要学术文章:《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从宏观着眼,从具体分析入手,史论结合,卓然成一家之言,是具有世界水平的鸿篇巨制,堪为后学之楷模。

安长春先生指出,很多人把吴先生的世界史观名为宏观史学,高屋建瓴,博大恢弘,提纲挈领。作为一种史学观点与史学方法,不限于世界史,用来研究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学其它分支学科,同样能够使人豁然开朗,学有新意,出现一种新的境界。东北师范大学长期从事中国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赵德贵先生认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无疑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中国史的研究,必须从世界的观点出发,把握整体和全局,在宏观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否则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及世界历史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坚信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必将迎来更为辉煌的时代。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